

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解读严复译著《天演论》

张霄军, 郭 畅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 翻译生态学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利用生态学的模式, 解释翻译现象。严复《天演论》的问世, 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 同时严译本《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 其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试图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 解读《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关键词: 翻译生态学; 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功能; 《天演论》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4)04-0319-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4.04.004

A View of Translation Ecology on *Tian Yanlun* by Yan Fu

Zhang Xiaojun, Guo C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linked closely with ecology, which means translation phenomenon can be researched under the modes of ecology. *Tian Yanlu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translated by Yan Fu, could not be published without a certain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Meanwhile, the translation helps to realize the translation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reflects the ecological laws such as Blackman's law of limiting factors, Shelford's law of tolerance and optimum rule in its translat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translation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other basic principles of Yan Fu's translation masterpie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ecology; transl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ranslation ecological function; *Evolution and Ethics*

翻译生态学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心理及生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学研究,将翻译与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1]3}。同时,翻译生态学从分析各种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对翻译

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翻译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入手,进一步剖析翻译的生态结构。严复是我国翻译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译著《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拟从《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等角度对该译著进行阐释,从而指出严译《天演论》的诞生是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诸多因子共同作用的产物。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张霄军(1978-),男,副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现代翻译技术。E-mail: Andy_zxj@126.com

一、《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

许建忠教授认为,翻译的生态环境,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 n 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具体说来,可以分为翻译的自然环境、翻译的社会环境和翻译的规范环境。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严复的译本的选择及其翻译策略的制定;同时,严译本问世后,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的转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社会环境

一般来说,翻译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基本要素。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腐败无能,屡战屡败,不得不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开始陷入民族危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主张人们放眼望西方。这之后的洋务运动则更加具体,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翻译的书籍主要为技艺方面的书,尽管有一定作用,但收效甚微,并没有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运动展开,维新人士们主张“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仅学“器物”不足以开民智,中国迫切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境况。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同时也是在甲午海战战败的巨大刺激下,身为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于1896年夏开始翻译《天演论》。

(二) 规范环境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气质与观念。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人们会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当某些特定的偏好和选择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得以保存并发扬时,就会形成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规范环境,它对于本民族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中华民族倡导爱国主义精神,例如“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种文化的感召与鼓舞下,严复为了唤醒同胞们的灵魂,尤其是士大夫们的救国热情,选择了翻译《天演论》。中华文化倡导包容的精神,主张“海纳百川”,加之闭关锁国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中国的有识之士急需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思想作为救国图强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严译本《天演论》无疑满足了这一需求。另外,严译本《天演论》在语言风格上选择的是古雅文言,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级认为白话文是利俗文字,登不得大雅之堂,只有古代文言文才是正统,在这样的规范环境下,尽管传播的是先进的西方思想,但严译本《天演论》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古雅文言而不是古代白话文。严译本《天演论》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并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二、《天演论》的翻译生态功能

翻译生态的结构特点就是这个系统由四个基本部分组成,即无机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其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是翻译群落的三大功能类群。在这个生态结构中,生产者就是译者,是翻译产品的创造者。消费者一般指译语读者,是翻译产品的享受者。而分解者就是指翻译研究者了,他们会通过对翻译现象的分析探讨,得出能指导翻译的相关理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这三个功能团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相互影响,相互协作,使翻译生态系统在整体上实现“生产”的目的。

(一) 生产者

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就是译者,即严复本人。在译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方面,严复起着主导作用。在《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严复可谓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是“做了一部《天演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即看其是否与原文一致,这种观点即“原著中心论”,它限制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译者隐身,降低了译者及译文的地位。相比较而言,后来出现的多元系统论则更重视译者的作用与地位,主张在译文中除了作者风格外,还可以有译者风格,译者既可以遵循源语言规范,进行“充分翻译”,也可以遵循目标语规范,侧重目标文本的可接受性。近年来,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以译者

为中心的说法,他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也就是说,“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可以保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地、自主地做出任何适应性的选择,甚至包括选择“被淘汰”^[2]①。从“原著中心论”到多元系统论,再到“译者中心论”的变化说明,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从“译者中心论”的角度分析,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采用桐城派古文风格,大量地运用改写、换例、“格义”以及“会通”均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在《天演论》中,除了译文外,严复还添加了大量的按语,《天演论》实际上是英文原著与严复的体会的结合体,译者作为生产者,充分发挥了其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 消费者

在生态翻译系统中,消费者就是译语读者或是听者,当时的主要读者为士大夫和进步人士。消费者在阅读的同时会对译文进行评判,同时,译文会对消费者产生相应的影响。孙宝瑄(1874—1924),是士大夫的代表,也是严译本的读者群中的优秀代表,他生前记有大量日记,其中有数篇是阅读《天演论》的心得。1898年12月17日,孙宝瑄对严译本《天演论》的导言四及其按语评论道:“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3]158-159 在阅读《天演论》之后,孙宝瑄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意识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峻的民族危机,而这正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初衷。除了唤醒民族意识,《天演论》的翻译还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为国人带来了新的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和人生观,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梁启超“戊戌时期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不时向严氏索阅著译文字并将其思想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4]318。除了士大夫,《天演论》还对当时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鲁迅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俸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许多人甚至因此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竞存”、“适之”等,例如著名学者胡适^②。

(三) 分解者

在生态翻译系统中,分解者就是翻译研究者,既包括当时的评论者如吴汝纶等人,也包括现在的翻译评论者和英语或翻译专业的学生。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对严复的影响很大,严复也将其视为良师益友,评价他为“平生风气兼师友,

天下英雄唯使君”。吴汝纶在给严复的信中写道:“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称中国人语。”^[5]251 在吴的点拨下,严复在译文中做了一些调整,删去了一些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句,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翻译评论者一般会从专业的角度,从不同的出发点对译文进行评论,从中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为译文做出价值判断,不但给译者提供专业性的建议和意见,而且把翻译实践提升到理论层次,创新翻译理论。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主张“译事三难,信、达、雅”,指出“信、达、雅”为“译事楷模”。然而,也正是这“信、达、雅”引发翻译界的不断纷争,概括起来共有三种观点:完全赞同,部分赞同以及完全否定。在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后来的诸多观点,鲁迅主张“信、顺”,张威廉主张“信、达”,刘重德主张“信、达、切”,傅雷的“形似与神似”说,许渊冲的“三美”等观点,可见这些评论家或者说翻译活动的分解者们在严译本《天演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丰富了我国近现代翻译理论体系。

在《天演论》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翻译作品,读者阅读作品,翻译研究者从专业的角度评论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使得译者翻译水准提高,读者接受新的思想,翻译研究者通过研究比较得出自己的观点,并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译者、译语读者以及翻译研究者互相影响,相互协作,促进了翻译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天演论》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翻译生态学是套用生态学模式来解释翻译现象的一种新的观点,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都可用来解释严译本《天演论》中的诸多翻译现象。

(一) 限制因子定律

德国化学家李比西认为,当植物所需要的营养

① 许教授则认为:“以译者为中心”就是强调以人为中心,是标准的人类学研究视角,这一切均与生态的和谐包容理念格格不入。

② 胡适,原名嗣糜,学名洪骅,字希疆,据说,受《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影响,改名胡适,字适之。

物质降低到该种植物最小需要量以下的时候,该种营养物质就会限制该种植物的生长,这就是最小因子定律。经过多年研究,人们发现生物在一定环境中生存,必须得到其生存发展的多种生态因子,当某种生态因子不足或过量时,就会影响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各种各样的限制因子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对于译者的译本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制定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受到了很多限制因子的影响,其中严复的个人性格因素十分重要。严复是个心高气傲、桀骜不驯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好友、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对他的评价中得知。郭在日记中记载道:“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负气太胜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皆然也。”严复的一生,虽不像郭氏所言“其终必无成”,但“负气太胜”恐怕是真的。郭在另一篇日记中记载道:“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6]郭嵩焘是严复的忘年交,对他的才学品性自然十分了解,从郭所言的“负气太胜”、“狂”可以看出,当时的严复,是何等的年轻气盛,何等的踌躇满志,面对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身为总教习的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他一定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拯救自己的国家,那就是通过翻译《天演论》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通过开民智、变制度来挽救中国。

严复接受了中英两种教育,他深谙中西两种不同的思想与文化,在当时他的确算得上是进步人士,但是严复的骨子里又有保守的一面。虽然他将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引进中国,但是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是不能“演”的。严复欲将其女严瑛许配给熊纯如的侄子洛生,洛生想依照西方习俗与严瑛先见面再订婚约,严复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必以其文明新法见拘,则前译悉作罢论可耳。”他甚至在信中写道:“略谓先熟后婚,西俗向来如此,然而胖合之后,牝离亦多,可知好合之情,不关乎此。吾俗向凭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然而琴瑟调者,尚甚重矣。”^{[7]688-689}除了儿女婚姻大事,在自己的仕途方面,严复同样是保守的。严复留英三年,成绩优异,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曾任北洋水师总教习,后升为北洋水师总办,但严复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而没有得到重用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是“学而优则仕”,不是科举出身,于是他连续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每次都不幸名落孙山,他不禁抱怨道:“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蚩。”^{[8]14}照理说,严复

有过留英经历,不该对洛生的要求如此反感,也不应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希望于科举,究其原因,严复虽有进步开放的一面,但骨子里还是保守的,他虽一只脚踏出了大门,但身心还是在屋内的。他性格中的这个特点在《天演论》的语言风格选择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当时,严复翻译《天演论》在语言风格方面有两个选择:古雅文言和古代白话。严复为什么选择了古雅文言呢?严复幼时曾接受过较为严格的传统教育,从七岁到十四岁,他都在私塾读书,他曾说过:“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信,无可思忖也者。”^{[7]1241}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同时也让他坚持自己的语言观,“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7]515-517}。除此之外,严复性格当中保守的一面也决定了他不会选择古代白话。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写道:“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着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9]43}《天演论》问世之前,古代白话文早已出现,作为知识分子及社会进步人士,严复没有选择更加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而是坚持用古文言文,一方面是深受桐城派散文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严复骨子里认为白话文是利俗文字,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严复接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又留学数载,回国后向国人介绍先进的西方思想时却仍旧采用文言文形式,不能不说是其保守的个性的体现。

翻译生态学认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限制因子对翻译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而通过对各种限制因子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在《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严复本人的性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因子,桀骜不驯的一面使他下定决心翻译此书,而性格中保守的一面又让他在阐述西方先进思想的时候以古雅文言文作为载体。

(二) 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1913年美国生态学家谢尔福德经过大量调查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一个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生物只有处于这个界限之中才能生存,而这个界限范围就是生物的耐性范围。耐性定律就是指生物对其环境的适应存在耐性限度。后来梅耶根据温度和水分的变化,又提出了物种分布最适区的原理。翻译生态学是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学科,生态学中的耐性定

律和最适度原则对许多翻译现象都有指导意义。严译本《天演论》中存在着大量的“误读”现象,所谓“误读”,就是指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已存在“先入之见”,而这种“先入之见”就造成了严译本中诸多的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误读。

赫胥黎在 *Evolution and Ethics* 一书中阐述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严复在译本中却主要讲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论》实际上是冠赫胥黎之名,行斯宾塞之实,整个取代过程是通过添加按语、换例、删节、改写等手段实现的。这样看来,严复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是任何对严复及其译本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严复的误读是出于对于国家和同胞的一腔热忱,旨在唤醒人们救国图存的意识。在翻译《天演论》之前,严复早就熟读了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著作,其中他最认同的当属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然而为了更易于让士大夫们接受,严复穿上了赫胥黎所主张的达尔文主义的外衣,带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入之见”来翻译《天演论》,从这一点上来看,严复的误读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是读者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的。

在书名的翻译上,也存在一定的误读。书名 *Evolution and Ethics* 直译就是《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译为《天演论》,他认为:“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10]2}《进化论与伦理学》这个名字过于深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最初接触这样的词语,难免有抵触心理;而《天演论》则更为通俗,并且从字面上来看,“天”字在古汉语中,有“道”的意思,可以指世间万物、大自然、宇宙等,“天”还有人格化、神格化的概念,可以指最高统治者皇帝。《天演论》这个名字体现了严复脑海中的中国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更易于士大夫阶层的人接受这种新的观点,同时也不失为译者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

严译本《天演论》中,在处理英语文本中的特定的语言文化时,严复会选择有意识的误读,使其目标读者更易于接受较为陌生的思想文化。例如,原著 *Evolution and Ethics*^[11]中,第二章有这么一段话:

As no man fording a swift stream can dip his foot twice into the same water, so no man can, with exactness, affirm of anything in the sensible world

that it is. As he utters the words, nay, as he thinks them, the predicate ceases to be applicable; the present has become the past; the "is" should be "was." And the more we learn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more evident is it that what we call rest is only unperceived activity; that seeming peace is silent but strenuous battle. In every part, at every moment, the state of the cosmos is the expression of a transitory adjustment of contending forces; a scene, of strife, in which all the combatants fall in turn. What is true of each part, is true of the whole.

译文: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逝矣。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湫,虽其形暂留,而漩中一切水质刻刻变易。一时推为名言。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天演论》第28页)

原文中,作者用“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事例来阐述运动与静止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而得出这样的观点: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严复在解释这样的观点时,增添了“仲尼川上之叹”这一源语文本中根本没有的东西,这种误读是译者有意识而为之,用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孔子的观点来佐证文中达尔文主义,进一步引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一来,可以提高中国士大夫的阅读兴趣,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从功能角度看译者,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同时又是译文的“作者”^{[2]13}。在创作译文的时候,译者必然带有明确的目的,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唤醒民众,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严复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译文更容易被接受。

总之,《天演论》不管是中心思想、书名还是具体内容,都带有典型的“严氏风格”,这种风格归根结底源于严复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又是基于严复本人的“先入之见”。当源语文本中的思想与译者的意识形态一致时,译者通常不会对其进行大的变动;而当译者认为源语文本中的内容与译者的“先入之见”不符时,译者通常会对源语文本进行有意识的“误读”。这种“误读”虽与原文本不符,但“误读”后的译文基本思想与原文仍然保持一致,关于这一点,许崇信教授有过这样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几乎无法避免车

体的上下抖动和左右摇摆,而这种抖动和摇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都不影响列车的顺利运行,只有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才会发生列车出轨或是倾覆的事故。也就是说,译文仍在耐性范围之内,仍然满足最适度原则,严复戴着原文本的镣铐起舞,却依然灵活自如,充满自己的风格,这也使得严译本在问世之后能迅速受到欢迎,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四、结束语

生态学视角把翻译研究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为翻译学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发展提供了可能^[12]。生态翻译学把生态学和翻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作者注:与本文引用许建忠之“翻译生态学”相关联的有另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生态翻译学”(胡庚申,2008),就二者的区别,笔者曾请教过许建忠教授本人。许教授回复“在胡教授眼里,翻译适应选择论就是生态翻译学,严格地讲,他还处在从人类学研究视角向生态学研究视角过渡阶段。如果仔细研究,胡教授力求构建他的生态翻译学,但又不能摆脱其生物学的研究视角,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而“翻译生态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翻译生态’的学问,是把翻译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来描写的”。就这个问题,笔者有另文专述。)。严复《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并且其翻译过程充分体

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本文从翻译生态学的视角对严译本《天演论》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希望对有关《天演论》的比较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 [1] 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 [2]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 2004,25(3):10-16.
- [3]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4] 李强. 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 [5] 牛仰山,孙鸿霓. 严复研究资料[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
- [6]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7] 王栻. 严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王栻. 严复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9] 韩江洪. 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0] 严复. 天演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Huxley T H. Evolution and Ethics [M]. London: Macmillan Co., 1893.
- [12] 刘国兵. 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外语教学,2011,32(3):97-100.

(编辑:朱渭波)

(上接第318页)

三、结束语

信息类文本因其特有的语言特点和翻译要求,汉译时需要在语言层面从多角度以多种策略进行补偿,从而实现理想的语际间信息传达。对于信息类文本的译者来说,无论采取何种补偿手段,都应在确保信息的正确解读及传递的同时兼顾目的语读者的等效反应,合理、灵活地把握手中的自由度。

参考文献:

- [1] Nida 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87.

- [2] 夏廷德. 翻译补偿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68.
- [3] Newmark P.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 [M]. New York:Prentice Hall,1988.
- [4] 李行良. 信息等值与翻译标准[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6-9.
- [5] 潘文国. 汉英语言对比纲要[M].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
- [6] Leech G, Svartvik J. 交际英语语法[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25.
- [7] UNESCO. UNESCO Science Report 2010 [M]. Paris: UNESCO Publi-shing,2010.
-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2010[M].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编辑:巩红晓)